

佐藤量、菅野智博、湯川真樹江編，《戰後日本の滿洲記憶》，東京：東方書店，2020年，368頁。

本書作為日本「滿洲的記憶（滿洲の記憶）」研究會的共同研究成果，着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從滿洲返回日本的遣返者，主要利用各個遣返日本人團體長年以來所發行的會報，考察擁有不同身份和經歷的遣返者各自記憶中的滿洲。此外，本書還關心這些遣返者及其後代如何背負着滿洲的記憶，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從內容上來看，本書由「闘う記憶（鬥爭的記憶）」、「葛藤する記憶（糾結的記憶）」、「周縁の記憶（邊緣的記憶）」三部構成。第Ⅰ部「鬥爭的記憶」，以從滿洲被遣返的日僑發起的「恩給請願運動」（撫恤金請願運動）為背景展開討論。首先，大野絢也的〈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國策會社滿鐵の表象とその変遷：一九五〇～六〇年代の恩給請願運動を事例に〉（〈戰後日本國策公司「滿鐵」的表象與其變遷：以1950至1960年代的撫恤金請願運動為例〉）一文，考察戰後的「滿鐵」因侵略性質被政府否定的背景下，「滿鐵會」為職員的撫恤金等問題與政府交涉的同時，將有關「滿鐵」的記憶集體化的過程。其次，湯川真樹江的〈滿洲興農合作社同人會の活動からみる戦前の表象と語りの特徴：恩給請願運動に着目して〉（〈從滿洲興農合作社同人會的活動看戰前的表象及其話語的特徵：着眼於撫恤金請願運動〉）一文，論述滿洲興農合作社同人會在撫恤金請願運動高漲的形勢下參與進來，並根據現實需要重構集體的滿洲記憶的過程。最後，飯倉江里衣的〈滿洲國軍出身日本人の恩給請願運動と滿洲國・滿洲國軍像〉（〈滿洲國軍出身的日本人的撫恤金請願運動與滿洲國、滿洲國軍像〉）一文，關注戰後被與關東軍區別對待的滿洲國軍出身者。作者認為該群體同樣陷入因其侵略性質而無法得到「名譽」的困境，而請願運動的受挫促使這一群體將對滿洲國、滿洲國軍的記憶美化，反而形成強烈的集體認同。

第Ⅱ部「糾結的記憶」，從個人的鄉愁或認同的角度考察滿洲記憶的不同面相。菅野智博的〈語られる「安東史」：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代初期における《ありなれ》を中心に〉（〈被講述的「安東史」：以1950至1970年代初期的《ありなれ》為中心〉）一文，關注曾在安東居住的、以日本工商業者為主體的安東會。該文通過分析該會會報《ありなれ》中的回憶錄，揭示安東會會員間共享的「官」與「民」雙重視角下的「安東史」。佐藤仁

史的くふるさとの語り方：大連引揚者二世の編纂物にみる満洲の記憶）（〈故郷的講述方式：大連遣返日僑二代の編纂物所見の満洲記憶〉）一文，關注從大連歸國的遣返日僑二代有關故鄉「大連」的記憶表述，並指出這種集體記憶的形成，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父輩們參與的大連開發的認同與讚賞。大石茜的〈青少年義勇軍の記憶：會報を通じた継承と変容〉（〈青少年義勇軍の記憶：會報所體現的継承與變容〉）一文，以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中的嫩江訓練所出身者為對象，一方面揭示八洲會會報《嫩訓の思い出》（《嫩訓的回憶》）中共享的「義勇隊精神」，同時也指出世代更迭和個體差異下呈現的不同的記憶表述。

第Ⅲ部「邊緣的記憶」提供性別與民族的多樣視角。佐藤量的〈女學生の満洲記憶：大連彌生高等女學校同窓會誌《彌生會々報》の分析から〉（〈女學生的満洲記憶：從大連彌生高等女學校同窓會志《彌生會會報》的分析出發〉）一文考察都市女性中女學生群體歸國後如何重新經營生活，及其抱有的満洲記憶。作者指出這些女學生中很多人十分懷念大連的都市光景，但同時心中又充滿內疚的複雜情緒。林志宏的〈冷戦體制下における大同學院同窓會：日本と臺灣の場合〉（〈冷戦體制下的大同學院同窓會：日本與臺灣的情況〉）一文探討「満洲國」官僚培養學校大同學院同窓會是如何以共同的満洲經歷為中心構建集體認同感的。另外，林志宏以大同學院校友臺灣人梁肅戎為個案，論述満洲生活的經歷對其在日臺關係史上產生的重要影響。森巧的〈戦後日本社會における中國歸國者をめぐる記憶とその変容：中國歸國者の會と鈴木則子を中心に〉（〈圍繞戦後日本社會中中國歸國者的記憶及其變容：以中國歸國者會與鈴木則子為中心〉）一文，關注不屬於任何組織、以個人身份被遣返回日本的群體（自稱為「中國歸國者」）。本文圍繞中國歸國者會會長鈴木則子的生涯展開，該會不僅促進「歸國者」們互相幫助，還積極開展中日友好交流等活動，共享記憶的同時不斷向社會輸出新的「中國觀」。

本書除了以上論文之外，還在各部份附加專欄，對於理解満洲記憶補充更多樣的視角。尹國花的〈間島中學校出身日本人の訪中と訪韓〉（〈間島中學出身日本人の訪中與訪韓〉）一文探討在中日韓間跨境流動的日本人的記憶特點。本島和人〈滿蒙開拓團「集團自決」の語りと「沈黙」：久保田諫さんとの出会い〉（〈滿蒙開拓團「集體自決」的講述與「沉默」：與久保田諫先生的相遇〉）一文講述經歷過戦後満洲移民集體自決事件的一位日本人的戦後人生體驗。安岡健一〈ある自分史にみえる満洲の記憶と地域史

研究の可能性) (〈一個個人史所見的滿洲的記憶與地域史研究的可能性〉) 一文旨在挖掘個人史、家庭史的豐富性，進而發揮其對於所在地域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甲賀真廣〈ある牧師國際移動と教會ネットワーク：アメリカ・滿洲・日本〉 (〈一位牧師的國際活動軌跡與教會網絡：美國、滿洲、日本〉) 一文講述一位日本牧師家庭跨地域的生活經歷，這段記憶對於基督敎史和移民史的研究也頗有價值。最後，安藤恭子在〈メディア關係者がみた滿洲〉 (〈媒體工作者所見的滿洲〉) 一文中指出，作為一名報導記者應肩負起關注和報導遣返者的責任，為這些曾遭遇苦難的人們發聲。

有關遣返者 (日語：「引揚者」) 群體的研究，中國學界給予的關注向來不多。日本學界也是近年才開始展開深入研究，其中蘭信三從社會中人的流動 (蘭信三編，《帝國崩壊とひとの再移動：引揚げ、送還、そして残留》東京：勉誠出版，2011年)、坂部晶子從記憶多層性的角度 (《「滿洲」經驗の社會學：植民地の記憶のかたち》，京都：世界思想社，2008年) 展開研究。在美國學界，玉野井麻利子 (Tamanoi Mariko, *Memory Maps: The State and Manchuria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和華樂瑞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都關注政治、種族、性別等因素與記憶形成的關係，指出滿洲記憶中所包含的「帝國」要素與戰後日本重建單一民族國家的需求的衝突。前者加入相關中國平民 (收養日本孤兒的家庭等) 的記憶，提供對照的視角；後者的研究則探討戰後文學、歌曲等藝術作品中的遣返者形象。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書具備的學術意義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通過對個體的滿洲記憶及其戰後生活的連貫考察，從微觀視角呈現遣返者記憶的多樣性。本書通過豐富的個案研究，展現公司職員、商人、軍人、學生等不同群體的滿洲記憶，同時也關注因性別、民族或社會身份等而被忽視的邊緣群體的記憶。微觀視角細化遣返者群體內部的差異，打破過去研究中遣返者的滿洲記憶多為「悲慘」、「苦難」的印象，生動呈現出陷於「加害」與「被害」雙重身份困境中的人們記憶的多樣性。本書的研究無疑是對該時期宏大歷史敘述的深入展開。

第二，呈現戰後日本社會的滿洲記憶如何被不斷重塑的複雜過程。本書的個案說明戰後日本社會的滿洲記憶並非單純的個體記憶，在因「加害者」的身份被政府有意忽視或被社會輿論否定時，部份遣返者通過不斷調整共同記憶的表述方式，與主流記憶對抗，以確立其自身的價值。此外，這種記憶

重塑不僅體現在同代人身上，還體現在代際交替中。例如，大連遣返日僑二代對於滿洲記憶多表現為鄉愁(*nostalgia*)，且這種記憶的背後暗含着對父輩們在滿洲所做的「建設」感到自豪的情感(佐藤仁史文)；八洲會會員間傳承的「義勇隊精神」雖然被抽象為集體記憶的標誌，但在代際更迭中，兩代會員分別基於各自不同的滿洲體驗對該精神的內涵作出不盡相同的詮釋(大石茜文)。總之，隨着主體、社會環境、表述目的等因素的變化，記憶在傳承的過程也不斷地經歷着重塑。而探討記憶重塑的原因，正是深入理解歷史的關鍵。

第三，本書搜集和運用大量收藏於個人或民間組織(同窗會等)的珍貴史料，其中尤以會報為主要形式。正如佐藤量在序章中所強調的，會報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史料，需要結合時代背景弄清作者意圖才能做出正確的解讀。本書的個案研究皆踐行這一方法，為如何利用會報這種史料進行記憶研究提供可參考的範本。

在討論本書的學術價值後，本人認為以下兩個角度似仍有深入探討的餘地。

第一，對於第Ⅲ部份「邊緣的記憶」中「邊緣」的理解。該部份所涉及的個案研究中，有人數極少的曾在大同學院學習的臺灣人(林志宏文)，也有以個人身份處在社會底層的群體(森巧文)。而佔據較優社會資源的都市女學生(佐藤量文)是否可以作為邊緣群體看待則有待商榷。這便涉及到一個問題，即本身作為社會邊緣群體的遣返者內部，是否進一步存在「中心」與「邊緣」的地位區別。如若存在，其導致的話語權的不平等是否對「滿洲記憶」的整體表述造成影響？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二，有關記憶與遺忘的兩面性。本書從遣返者的視角，探討滿洲記憶如何被保存下來，進而影響他們在戰後的生活，並指出這種記憶在戰後遭到冷落和遺忘的際遇。本人認為這種遺忘從反面說明戰後日本社會對於集體記憶存在一個選擇與重建的過程。例如，玉野井麻利子指出中日恢復邦交後出現以重遊遣返路線為主題的旅遊業(*memory industry*)，而這種旅遊不僅表達一種「鄉愁」，更用這種「鄉愁」的記憶取代日本帝國侵略滿洲的記憶。那麼在類似的記憶重建的過程中，主流的集體記憶如何與滿洲遣返者的集體記憶發生衝突，兩者又是如何各自變化、共存至今的呢？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或許有利於加深對滿洲記憶與戰後日本社會之間的錯雜關係的理解。

辛孟軻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